

劲旅文化



近代上海科技先驱 之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

王尔敏 著

王尔敏 著

近代上海科技先驱 之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经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宇宙光出版社)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14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上海科技先驱之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 / 王尔敏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95-0331-5

I. ①近… II. ①王… III. ①医院-历史-上海市-近代 ②书院-教育史-上海市-近代 IV. ①R199.2
②G649.29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0458 号

出品人:郑纳新

策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余红

装帧设计:赵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4.75 字数:110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自序

2005年6月中旬,我承香港学界邀约,特赴港与各方学人会晤。有两个重要集会我必须参加。其一是香港浸会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孙中山研究专刊”的项目下,由我主讲专题:“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计与兴国远谋”,是在6月15日上午举行。其二,大陆和台港研究基督教史的学者,今年在港举行学术讨论两天,即在6月17、18两日。会议主题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历史回顾”。香港主办地出席学者最多,有梁元生、梁家麟、周佳荣、李金强、李志刚、吴梓明、邢福增、刘义章、黄文江等。台湾来的学者有林治平、查时杰、苏精、林美玫等,而林治平被邀作大会开幕主讲人。新加坡来的学者有庄钦永,北京学者有段琦、赵晓阳,南京学者有冯羽,上海学者有王立诚、杨剑龙,广州学者有贺璋璐等。可以说名家云集,济济一堂。我有幸与会,自是荣幸。

这次学术会议使我最感荣宠者,乃是在第二天的大会中由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报告我在近代基督教史研究上的贡献,并以研究同道的爱重之下,公同给我一个崇高的令誉,就是代表在基督教史研究上有重大贡献。

我自感念同道们的垂青,感谢大家的特爱,认为是我古稀之年领受学界的崇重与肯定,实是欣喜莫名。

我自己盘算一下,生平研治近代史,当然以治思想史所下的功力最大。包括近代思想史三本著作,尚有和李云汉教授合写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正解以及民生主义正解各一本,在我著书之中占了五本。尚有一些散落的论文,数量并不小。而我在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有十九个年度之多,可说是我用功最多的一门。其次,我研治近代军事史有三本著作,可算是我另一门专长。再其次,我写了明清社会文化史有两本书。并有秘密社会史论文,也敢自信是一门专长。再其次,我写了一本近代外交史,和一些论文,自亦算得上一门专长。最后才可以说到我在基督教史方面的成绩,根本使我感到惭愧。我可以凑成一本书。而较之我同时起步的吕实强教授、李恩涵教授和王树槐教授来作比较,我是瞠乎其后,很难叫学术界恭维我这一门专长。今天想来,我是应该惭愧的。

当然我也有安慰自己的理由。很有一点忍不住的心情要宣示士林。当然必要写在序文里,炫一炫我的门人高弟。由于他们个个青出于蓝,各擅造诣,也使我的招牌显亮起来。在我的学弟之中,有五位专攻近代基督教史。第一位是梁家麟博士,他的著作远超过我全部一倍以上,有四十余种专著,已是宗教界名家,学界领袖,承他的厚爱与崇重,使我得享荣名,真是欣慰。第二位是李金强博士,他是研究浸信会的权威学者,并研究中国信徒黄乃裳、王炳耀,香港的基督教学术研究,以他所任教的浸会大学为推动中心,今年是第四次召开学术讨论会,他的贡献甚大,所费心力甚巨,我是沾其宏名,而受崇重,感幸亦且感愧。第三位是邢福增博士,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他的著作也超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依其辉煌成就,我自广沾实惠,心下深慰。第四位是魏外扬教授,三十年前我就指导他做论文,研究中国基督教信徒沈毓桂。离校之后,又广著西洋教士传记之书。出书质量,成就过我。我自

以专业成就,而备沾荣宠。第五位是姜仁圭博士,韩籍出身,久寓华夏,是我晚年所指导的门人,今时已是中原大学副教授。姜同学好学过我,爱人以德,信仰坚诚,我皆不如,自以其为荣。

我这次在港参与了基督教史研讨盛会,已是得益之人。而因缘际会,相遇林治平、查时杰两位教授。两位俱是多年老友。而林教授更是我们学术界一位有魄力的领导人,多年来他策划了不少重要的学术会议,出版了很多基督教史论著与纪念集,我自是时常被邀,备受礼遇,亦并心愿支持林教授推动多样活动。承他相告,眼看就要到了2007年,这是基督教史上面临世纪的纪念日。就是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到华传教的二百周年,凡我研究基督教史的学者,躬逢这个世纪大关,岂可不有一番重要的行动,表达这一代人的全程回顾与展望未来。经林教授细心策划,将为前一个世纪之研究成果作一总结性的蓄存,以备下一世纪学者观摩与开拓,这是极佳构想。林教授计划之中,将出版三十种前期学人著作,当然尚有其他重要活动,正足见出林教授远大眼光与推展决心,令人钦佩。

我承林治平教授嘱命,要我能将有关基督教史的论著,提供他列入这个世纪纪念集的一本书,在他设想的数量,是要刊印三十种著作,我是不够资格的一位。有幸被其选中,只好应命担承。但这也是原本之于一一点过去的背景。

我必须曝白一些治学的背景,以供识者同情检证我的一点微薄的声名之获得。我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9—1961的两年之间,承业师郭廷以所长之命,与学长吕实强、李恩涵合力编纂《教务教案档》。从此直接大量翻检近代反基督教的史料,并加整理,按年份编成书。分为第一辑三册,第二辑三册。这只是表面交代,内容无须详述。由此经验,使吕实强先生、李恩涵先生俱以反教问题论著而蜚声学界。我则因不便挤在一块领域,把研治目光投注在西洋教士的在华传教以及中国基督徒。为此目标,我即在1963—1965年在英国各教会访

查教士来华传教的史料。可以算是有了一定的研究领域。这样前后四五年的搜考参阅,自是能够做一些研究实绩。

这一目标,我自力证明,短时尚不能实现。恰当 1968 年我受到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担任高级专家(Senior Specialist)名位,驻校一年,自然使我分神用心于思想史领域。实在前后有两年时间未再涉阅基督教史料。所幸我在夏威夷大学见到《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微卷,另有很罕见的《中外新闻七日报》,是英国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在同治四年至六年(1865—1867)所编刊的报纸。自是可贵的史料,此外又看到一套《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这四种书向夏大教授郭颖颐先生情商,向图书馆主任借到各胶卷及原书,寄到台北影印出版。想来这可算是我对于基督教史料推广有点贡献。在此题外补充说,请别小看在台北影印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近年大陆上出版排字本三册带索引,此前又有房兆楹先生早年所编印的排字本,俱不及这套书原始详备。尤其明代进士题名之下除大多数不注出身,而少数出现有军籍、盐籍、灶籍、匠籍等特殊出身而考取进士者,此在他书决然无有,颇有参考价值。

本年六月之会,承林治平教授囑命以拙著参与 2007 年基督教入华二百周年的纪念大会,真是躬逢盛世,机缘难得,自当踊跃以赴。此次旅港之行结束,满怀兴奋,返回多伦多寓所。经理拙著,收辑两种相关西洋教士对于中国近代科技知识之贡献,提大会收编,以冀附骥群贤之后,分沾令名。此书题名为《近代上海科技先驱之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尚祈同道不吝指教。

最后,我诚恳地宣白,以我自己的估断,在我治学的成绩上,我所做的基督教史研究,贡献是很微薄的,功力也是单弱的。所能维持自信的地方,是有五位门人从事基督教史研究,至少有四位青出于蓝,远超越我的成就。足能使我分沾令誉,受人尊重。

此外,我也以尽绵薄之力,发掘和推广基督教史研究资料,这一点

也是广被同道肯定。我亦为之心慰。由此看来,我能在2007年这个重大的世纪纪念日,附骥于济济群贤之后,共赞心力,共襄盛举。这真是我一生有幸,逢此际会。在此谨志不忘。

2005年9月7日

河南周口王尔敏序于海外寄寓

目录

CONTENTS

自 序 / 1

上海仁济医院史略 / 1

上海格致书院志略 / 43

一、倡议之酝酿及经始活动 / 44

二、书院建置及其规模 / 51

三、科学知识之引介与推广 / 65

四、科技教育课程之实施 / 71

五、新代新思潮之启发 / 85

六、结论 / 111

附录一 / 121

附录二 / 124

中西译名对照表 / 133

征引书目 / 137

上海仁济医院史略

站在中国现代化这一角度,评估基督教的关联与影响,无论在十九世纪早期以至后世明朗可见的成就,当必优先想到西方医学的输入,教会医生在华的贡献,中国医疗主体的嬗变,医学教育制度的建立,西医诊断医院的扩展,中国西医医生的辈出。明显确切地走上医学的全盘西化,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中医中药固然有其拥护者、信从者,而至今可以大胆宣说,西医已据中国医疗主流,当非过度夸炫。其创迹开始,涓涓点滴,实起于一百余年之前。

就史实确切起算,其时似应以道光十四年(1834)冬,美国医生伯驾(Dr. Peter Parker, 1804—1888)到达广州开始。道光十五年(1835)十一月,即在广州城外十三行街的新豆栏(Hog Lane)开设博济医院,是为中国土地上第一所西医院。^①一般来说,伯驾虽是在华为首开设医院,实际却非在华行医最早的医生。就清朝宫廷来说,早在十七世

^① 魏外扬著:《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页63—70,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8年11月初版。

纪已有耶稣会士为康熙治病。此且不表。即就中国民间而论,也早在十九世纪之初,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波臣(Dr. Alexander Pearson)、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ge)、安诺特(Thomas Arnot)、哥顿(Gordon)、韩顿(Thomas Hutton)、柯克司(Richard H. Cox)等七人在十三行街时常为华人治病,并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澳门开一诊所。尤其为幼童种牛痘,当时远近驰名。正确推算,可至嘉庆十年(1805),东印度公司所刊行中文书《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为切实论据。^①

现在就西洋教士在华医药工作而言,伯驾自是兼传教与行医。由于应诊民众甚多,乃随时邀约郭雷枢、柯克司、白拉福(James H. Bradford)、安德逊(Alexander Anderson)和渣甸(William Jardine)等医生前来相助。自道光十六年至十七年间(1836—1837)伯驾、郭雷枢及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商议成立一个医药传道会,可以募集捐款,在华设立医院。此事在道光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1838年2月21日)正式开会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当时公举组成执行委员会。以郭雷枢为主席,以伯驾、渣甸、李春(George Tradscant Lay,又名李太国)、裨治文等任副主席。会章规定:会员年费十五元,凡一次交足一百元者为永久会员,一次交足五百元者为永久董事。其时交足五百元任永久董事者有渣甸、颠地(Lancelot Dent)、马地臣(James Matheson)、殷吉利(Robert Inglis)、伯斯东芝(Framjee Pestonjee)、怀特民(J. C. Whiteman)等。交足一百元者有二十四人。其中即有义律(Charles Elliot)、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以及怡和行东伍秉鉴(Howqua)。^②

中华医药传道会成立不久,郭雷枢离华回英,主席改由渣甸担任,

① 李志刚著:《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页243—257,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6月。

② 李志刚著:《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页248—249。

而实际主持者则是伯驾医生。经伯驾的运用策划,使医药传道方式奠定初基,并向广州以外地区推进。中间立即遇到鸦片战争爆发,故在1839年至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这一段期间,颇有数年停顿。然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首年(1843),上海华人医院即随之诞生。

二

伯驾医生实际负责中华医药传道会,即于同一年中,在澳门开设第二所医院,最初全恃广州博济医院人员支持,不久两院均展开医疗业务,工作十分忙碌。正在需人之际,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遣雒魏林(Dr. William Lockhart,又名洛颌,又名六吉,1811—1896)于道光十九年(1839)一月到广州,宗旨是应中华医药传道会要求被派来华。伯驾获得重要助手,雒魏林立即承担澳门医院主持工作,可惜此时正逢林则徐查办禁烟,西洋教士亦不能立足广州。在1839至1840年间,两处医院不得不暂时停顿。雒氏亦远避南洋。但在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雒氏再回澳门,八月医院复业。同年十二月另一位医生合信(Dr. Benjamin Hobson)亦由伦敦会派遣来广州。嗣并协助雒魏林在澳门行医。^①此时鸦片战争虽在行动之中,而医药传道会却有远见地要向中国中北部发展。雒魏林将澳门工作托付合信,即于1840年后期进驻舟山,一面为英军疗伤,一面在定海为华人治病。其时有宁波、杭州居民远来求医。道光二十一年(1841)初(2月)雒氏再回澳门,于同年9月在澳门与其新夫人 Catherine Parkes 结婚,在澳门停留一个较长时期。但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雒氏偕夫人又到舟山,同一年中又到宁波、上海访问。由于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订,中国沿海开放五口通商,雒氏

^① 李志刚著:《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页250。

终于1843年11月5日到达上海,他比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Sir George Balfour)尚早到几天。^①当时决定在刚开放通商之始,即于上海开设一所医院。其时伦敦会另一教士麦都思(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亦于1843年12月23日到上海,两人立即展开筹划,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1844年2月)在上海大东门外南道(Nan Tao)地方,创建一所诊所,是为上海开埠起第一所西医院,也就是上海仁济医院前身。但不久,在同一年中雒魏林医生又在上海小南门外选租房屋,约在1844年10月迁移院址到小南门外。^②

雒魏林在上海初创医院,一来病患众多,自1844至1845年,来医院被诊治的病人达一万九千人之多。二来上海开埠地带选在北门外黄浦江两岸洋泾浜北岸为主。若有发展扩张,须自行购地建筑医院房舍,而北门外开放外商建屋营业,外人购地,较易进行。因即设法筹款,计于洋泾浜北岸购地建房。适伦敦会麦都思牧师亦在此一地区访觅空旷荒地。在道光二十四年末,时已至1845年1月,雒魏林以每亩四十元购得五亩半地。即是以二百二十元购地一区,距上海北门外半英里。即当于后日之山东路与福建路之间,同时与麦都思所有伦敦会教会房址为邻。至此而成为医院永久定址,日后只有扩大,并将伦敦会房地合并。上海仁济医院即以此基础,为一医药传教首脑中心。这是雒魏林的重大贡献。故在上海洋人社区,被称为是仁济医院之父。^③

① 巴富尔于1843年11月8日到上海,而上海正式开埠通商则在同年11月17日。参阅王尔敏撰:《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载《中华学报》二卷二期,台北,1975年印。

② E. S. Elliston: *Ninety-five years A Shanghai Hospital*, p. 5, Shanghai, 1940. 本书确定指出,雒魏林开办上海华人医院的时间,是在1844年2月初。

③ Ibid, p. 6 In December, 1845, a piece of land, measuring about $5\frac{1}{2}$ mow, had been purchased by Dr. Lockhart, and enclosed with a hedge, at a total cost of about \$220, say, at about \$40 per mow. This land was largely paid for by the fees which he received from the then foreign residents of Shanghai for his personal medical services to them. It was about half a mile north of the North Gate of the Native City, some way inland from (转下页)

当时上海华人医院建筑费约在三千至三千五百银圆之间,全部由医药传道会出面募捐,包括在英在华工商及教会人士筹募。于道光二十六年夏天(1846年6月)建成,医院新址,是即名闻上海的山东路仁济医院。雒魏林随即将南门外医院全部迁入新址。此次建筑基金只筹足二千三百八十一元,余不足之数,另向上海丹拿洋行(Turner and son Co.)贷款一千元。直至1850年方始还清。^①

此一华人医院院址,正当上海北门外商埠地区中心,正面位于山东路,适与邻近福州路之伦敦会为邻。原来牧师麦都思与医生雒魏林俱属伦敦会,抑且麦氏实为雒魏林早期中文老师,在施医布道方面,二人合作无间。这一地区,开埠前本是荒田,由于麦都思来此建屋居住并传教,因是上海居民习称之为“麦家圈”,地名一直沿用至后代,而医院院址,亦包括在此地名之内。^②

(接上页)the Whangpoo(黄浦)River, situated between the then main roads leading from Shanghai to Soochow(苏州)and Kading(嘉定), which roads approximately coincided with what are now Fokien and Shantung Roads. This land was registered in the British Consulate as Lot No. 60 and adjoined certain other land, Lot No. 61, which had been purchased by Dr. Medhurst for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The ownership of this land (Lot No. 60) was subsequently transferred to the Hospital Trustees on 28th September, 1848.

① Ibid, pp. 6-7.

② 姚文纂:《上海县续志》,上海,1918年刊印,卷二,页45—46:“仁济医院在公共租界山东路(即麦家圈)。咸丰初年,西人创设。邑向无医院,凡病患或受伤者辄赴焉。光绪三十二年及宣统二年间先后改建男女病房,规模并备。院设总理并中西董事,募捐充费。”

按:中文地方史志,对于西医院记载极为少见。即以《上海县续志》而论,已是方志中上乘之作,其所记仁济医院,只占三行文字,且不免粗疏错误。惟其足备重要参证者,则在“麦家圈”地名之附载,可解除西方文字之疑误。

又, E. S. Elliston, *Ninety-five years A Shanghai Hospital*, p. 9: Later on he (Rev. W. H. Medhurst) resided at the organised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ompound near Foochow Road, in the locality that is frequently referred to even now in certain Chinese circles as Ma-ka-chu, meaning “Medhurst family enclosure”, this term including the present hospital site. During its early days, Mr. Medhurst was ver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is hospital, being one of its original seven Trustees and actively occupying that position until 1856.

本文中之 Ma-ka-chu, 即是“麦家圈”之对音。

雒魏林主持仁济医院十四年之久,直至咸丰七年(1857)年底离华返英。在1858年接受皇家医学院院士头衔(F. R. C. S.)不久,又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八月来华。在上海稍停数日,即往北京。其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且刚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开始在北京建立使馆。雒氏即在此开办另一所医药传道医院,是即后日著闻全国的协和医院。^①

雒魏林经十四年草创经营,使上海仁济医院建立良好基础。乃于咸丰七年尾(1857)决计返回英国,即将医院交付合信医生主持。合信(Benjamin Hobson)医生与雒氏同属伦敦会,在道光二十年冬(1840)到澳门,并接替雒氏主持澳门医院。而在1842年《南京条约》订定后,香港租借于英属。合信即于道光二十三年中(1843年6月)在香港开设另一所医院,是为中华医药传道会在香港分支。合信氏固一再在港澳开设医院,于华人社会已是贡献至巨,而其更受华人称颂者,则在于道

① E. S. Elliston, *Ninety-five years A Shanghai Hospital*, p. 8; William Lockhart, its founder, was born in Liverpool on 3rd October, 1811, and received his medical training at Guy's Hospital, London. As a member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he set sail for China in August, 1838, arriving at Macao in January, 1839, the first British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It has already been noted that, after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under Dr. Medhurst in Batavia in 1839 and 1840, he first arrived in Shanghai in November, 1843, after two earlier visits to Chusan. Dr. Lockhart organised the hospital work from its commencement and remained in charge until 6th December, 1857, on which date he sailed for England, it being his first furlough for nineteen years. He was an elected Trustee until 1865. He spent most of his leave near Reading, also visiting many hospitals, and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he was elected to a Fellow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proof, if any is necessary, as to his professional skill and ability.

He returned to Shanghai in August, 1861, staying here only for a few days, proceeding to North China, where he opened up further medical missionary institutions, first in quarters in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His memory is perpetuated there in various ways, but principally by what is now known as the Lockhart Hall of the P. U. M. C. He returned to England in 1864, settling down at Blackheath, near London, eventually dying at Lewisham on 29th April, 1896, at the age of 85.

光二十八年(1848)合信进到广州,在西关外金利埠开创惠爱医院,救人无数,誉满粤东。^①

合信在粤行医十余年之久,当咸丰六年末,即1857年初,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合信经营十年的惠爱医院竟被乱民纵火焚毁,所用医书器具,完全付之灰烬。合信即于是年避居上海,从事著书。除早期在粤刊行之《博物新编》、《全体新论》久已流布海内者,而在上海又著成《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数种。俱为早期传布西医之中文著作。尤其合信氏所编西国药石名目,实为西医词汇最早有系统的译成中文。^②

咸丰七年(1857)雒魏林即作返英之计,适合信在沪,正可托付接掌仁济医院,亦如昔日之接替澳门医院工作,合信氏当是理想人选。惟天不作美,合信氏工作一年即因健康恶化而无法留下。即于咸丰八年(1858)将仁济医院托交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H. Collins)接管,径自于咸丰九年(1859)返英疗疾。当时人以其为脑中风痹,不幸于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1873年2月18日)病逝于家,享年六十

① 王韬著:《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页28:“英医合信氏传”。

② 王韬著:《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页28—29:“西医合信氏,英之伦敦人。明于医理,于十三科咸所精究,而尤能以新意变通。在英伦医院考列超等后,欲行其道于中土。遂至粤东,设院于羊城西关外金利埠。曰:惠爱医馆。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在粤时著有《博物新编》,词简意尽,明白晓畅,讲格致之学者必当由此入门,奉为圭臬。以中国向有铜人明堂图,辨窍穴之方位,证脉络之流通,华医家皆以此为金科玉律。合信嫌其语焉不详,挂漏殊多,未足为法。乃别撰全体新论一书,外而筋骸节干,内而脏腑络包,无不精详赅备,洞见要处。潘君仕成特为之刊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一时脍炙人口。咸丰六年,中外交涉事起,西关之喜于生衅选事者集众举火,遽焚其馆。医书图画绘于石板者悉成灰烬。合信避兵至上海,公余之暇,著书自娱。时金陵管君小异方旅寄邓尉。西士艾约瑟偶游其地,一见悦之,载之至沪。偕合信翻译各书。两年间著有《西医略论》,专讲疮疡,外科之正宗也。其次有《妇婴新说》、《内科新说》,于后附以西国药石,亦泰西本草之别行本也。”

四岁。^①

顾惠廉属英国圣公会传道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牧师, 自 1858 年接掌仁济医院, 主持院务仅有二年之久。适伦敦会派来韩雅各医生 (Dr. James Henderson, 1830—1865), 于咸丰十年春 (April, 1860) 到达上海, 随即接主仁济医院。韩雅各在历年医院年报, 开始提供中文本与英文本, 显见其时上海华人教友及社会富绅多已热心重视仁济医院在上海重要性, 已有华人巨量捐款, 时方当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足以代表重大改变。^②

韩雅各主持仁济医院约达五年之久 (1860—1864), 因健康关系辞去院务, 前赴日本养病, 不幸以三十五岁英年病逝日本长崎。

韩雅各离职之后, 仁济医院由上海当地医师 (Local Foreign Community Doctor) James Johnston 接任院长。一直主持院务至光绪九年 (1888), 前后任期达十八之久 (1865—1883)。关于此一时期医院日常工作及重要变化, 当于下一节合并论述。^③

自光绪十年 (1884) 起直至光绪三十年 (1904), 仁济医院在此二十年间, 为上海地方外籍医师 Henderson、Macleod 和 Mills 三人组成的 M 公司所主理, 由三人联名主持院务。至光绪二十四年 (1898) 改由 Macleod、Mills 和 Marshall 用 M 公司名义联合主持。直迄光绪三十年 (1904), 由于服务医疗之繁忙及求医者之大量增长, 使 M 公司医生们

① 王韬著:《浣园文录外编》,卷十一,第29页:“合信自至中国,二十余年,活人无算。艺术之精,近日罕埒。其为人谦逊和蔼,谨默肫笃,有古君子风。以咸丰九年春官旋梓里。游囊中所蓄无赢费,家居况味萧然,门可罗雀。旋患牙风,几毁其半面,而自以药石治之始愈。顾其脑受病已深,每遇事若有所忘,或无端独自笑语。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疾终于家。寿六十有四。噫!合信氏虽寂寞于当时,必显扬于身后。其所著五书,今已风行海内,不胫而走,没世之称,可为操券也已。”

② 韩雅各编:《上海医院述略》,1861年印中文年报。(原藏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全12页)

③ E. S. Elliston, *Ninety-five years A Shanghai Hospital*, p. 15.